

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

寸红彬，张文娟

(昆明理工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任何一种语言都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紧密相连并相互产生作用。语言的生态环境是指对语言的形成、发展与灭绝起着调节与制约作用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总和。语言的生态环境分为外在生态环境和内在生态环境二外在生态环境对于语言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章拟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探讨导致这些语言濒危的普遍原因。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濒危语言；语言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6)07—0146—05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 Haugen)指出，所有特定的语言都和其所处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之间互相产生作用，而这种作用可以视为特定动植物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作用。豪根认为，生态语言学就是探究特定语言 and 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学说。穆尔豪斯勒(Mühlhäusler)立足于豪根的思想，进一步将生态语言学定义为：生态语言学是探索作为生态分支系统的语言与综合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学科。

语言的生态环境是指围绕语言这一核心，对语言的形成、发展与灭绝起着调节与制约作用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总和，实际上就是指语言所处的生存环境。语言的生态环境分为外在生态环境和内在生态环境。外在生态环境主要包括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普遍意义中的语言外在生态环境因素：笔者在本文中所探讨的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环境主要是外在生态环境。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和大众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在汉文化和周边强势语言文化的影响下，逐步丧失了母语使用能力。^{[1] (P351-356)}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急剧减少，使用领域不断缩小，使用功能日益萎缩。在云南，濒危或临近濒危的语言有 7 种，它们是分布在怒江福贡县的阿依语、德宏盈江县的仙岛语，怒江泸水，兰坪县的柔若语、文山麻栗坡县的仡佬语和普标语，文山马关县的拉基语和文山富宁、广南县的布央语。^{[2] (P111-119)}

根据对云南 7 种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调研和评估，笔者认为，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可以概况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促使语言地位和语言使用功下降的历史环境因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0xYY006)

【作者简介】寸红彬(1971-)，女，云南腾冲人，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研究；张文娟(1977-)，女，山西运城人，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语言教育研究。

（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领导，也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尤其是雍正4年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所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最具代表性。“改土归流”并非单纯的行政措施，而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地方民族政策。^{[3] (P80 — 87)} 例如，在政治上，废除土官、土司，改派普通行政官吏，并规定这些地区的官吏不得世袭，而且其任免、升迁、调遣等均由中央政府决定。在军事上，解散了土司原来拥有的土兵，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兵驻屯，在这些地方设立屯堡。在经济上，封建地主经济取代了原来的领主经济和奴隶制经济，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对于原土官分配给各族农奴的“份地”，清朝政府采取了清查田亩，以定租赋的形式，承认原耕户对它的所有权。在文化方面则举办义学，各少数民族子弟只要自愿读书的，都可以送人义学。

在原本的土司制度下，各少数民族族群的首领或头人就是地方统治者，他们处理政务、协调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官方用语就他们的母语，在相对比较封闭的语言环境下少数民族母语的的地位较高，使用功能也很强，应用于政治、经济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改土归流后这样的封闭局面不复存在了，由于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吏并非当地少数民族，这样汉语就取代少数民族母语成为官府处理政务和各种事务的官方语言，这就使得少数民族母语的的地位不断下降，其通行程度和使用功能也随之降低。

改土归流使土官割据一方的局面被打破，内地汉族人口大量进入云南，他们或是以戍军及其家属，或是以垦户、开矿等形式进入云南，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族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后来开始占据多数地位。随着汉族人口比重的加大，汉语言和汉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与当代少数民族交流中汉语迅速占据了优势地位，使得少数民族也不自觉地开始学说汉语。

（二）儒学的传播及科举制度的推广

清朝政府为确保各少数民族人民通过接受儒学和汉文化的教育并最终成为帝国直接管辖的臣民，开始在云南创办义学，鄂尔泰在进行“改土归流”的同时也在云南广泛地建立学校推行教化，以达到“以汉化夷”的目的，使儒家的教化逐渐渗透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中，从而消除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文化隔阂。

雍正十一年到云南任职的陈宏谋在云南广泛建立学校推行教化。他督令全省各府州县必须采取措施支持地方办学，当时云南实际建立的学校总数达近700所之多，而且地域分布十分广泛。^{[4] (P15-20)} 通过举办义学，汉文化的部分先进理念和价值观念在云南民族地区传播开来，少数民族群众从孩童时期就能受到中原汉文化的熏陶，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也不断增强。随着儒学和汉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汉语的使用频率也日渐频繁。在清代云南所设的学校里，教材是用汉文字书写的，授课语言也是汉语，少数民族往往是通过“先通汉音，渐识汉字”来开始他们的启蒙教育的，这对汉语和汉文字在云南民族地区的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唐时期，是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它通过科举取士吸收儒家优秀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阶层，对各族人民自觉学习汉语和汉文化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改土归流以来科举制度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得更为紧密，非科举不得为官的制度也在刚刚改流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确立。科举制度的推广为有知识通汉语的少数民族提供了晋升更高社会阶层的机会，从而掀起了各族民众学习汉语和汉文字的热潮。

随着汉语和汉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强势地位的确立，少数民族民众开始自觉自愿地学习汉语和汉文化，他们母语的地位和使用功能就逐渐下降，原先只会讲母语的少数民族民众从单语者转变为兼通母语和汉语的双语者，这为他们后来的语言转用奠定了基础。

（三）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实行“改土归流”后，云南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深刻的对汉文化的认同过程，从原先的被动认同变为主动接纳和吸收汉文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云南一些少数民族改变了原有的祖源记忆，通过改汉姓、冒充汉族的方式去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5] (P113-119)} 例如，在科举考试中少数民族往往受到歧视，这使得他们很难在科考中脱颖而出，踏入仕途，因而许多少数民族便假报民族身份和攀附汉姓。其次，在改土归流后，许多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被汉俗所取代。例如，改土归流前，在婚恋和性爱上比较自由的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在改土归流以后则像汉族一样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戒律。又如一些少数民族原先有火葬的习俗，在改土归流后也效仿汉族改为土葬。除此之外，在其他诸如服饰装扮、节日庆典、忠孝节义等方面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也不断加深。

总之，由于历史环境因素，云南的各少数民族经历了持久而深刻的对汉文化的认同过程，在这个汉化的过程中学习和使用汉语和汉文字是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少数民族母语的地位和使用功能不断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民族群体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转用汉语，最终导致其母语处于危险的境地。

二、导致语言族群消失或减少的自然环境因素

语言族群是指使用某种语言的使用者群体，所有语言都有使用的族群，若是使用的族群消失不见，就意味着语言也会消亡。^{[6] (P61-62)} 语言族群消失存在两种可能：第一，族群人员消失；第二，族群人员离散。

重大疾病、战争、自然灾害等突发性的事件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灾难在灭绝人类族群的时候，也影响了族群语言的生存与发展。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族群也曾经历过疾病的严重威胁。例如，分布于盈江县的仙岛人原先和阿昌族属于同一个支脉，之后的迁徙中逐渐分离，成了一个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独立族群。仙岛人数本来就少，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爆发天花，一天之中死掉很多人，仙岛人口剧减，从最初的 300 多户人家变为 40 户左右。据 2011 年 2 月的统计，仙岛人只有 92 人，仙岛语也因为使用人数极少而走向了濒危。^{[7] (P162-164)} 又如，分布在文山富宁、广南两县的布央人也遭遇过疾病的袭击。李锦芳的研究中记载有个原为布央人村子的西林房央村，因发生传染病全村人死去，后来壮族人迁来居住，“房央”即是壮语“布央鬼”之意。^[8]

语言族群的分离或失散也可能使其使用的语言由于无所依仗而灭绝。例如，仡佬族最初聚居在贵州，当时由于地位显赫，族群壮大，仡佬语生命力比较旺盛。但是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由于受到官军和土司的驱赶和迫害，居住在黔西南的部分仡佬人渡过红水河迁徙到了广西和云南。迁徙到云南文山的仡佬人无论是在人口方面还是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处于弱势，在当地的语言生态中仡佬语也处于弱势，为了能够和周边民族尤其是汉民族交流顺畅，仡佬人只能放弃自己的语言，转用当地强势的语言——汉语地方话：

在我们所调研的语言中，不仅是仡佬人经历了迁徙和族群的分离，其他 6 个少数民族群体——仙岛人、普标人、拉基人、阿依人、柔若人、布央人也都经历了辗转迁徙、族群的分离失散、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等。

三、制约语言选择与语言使用的经济环境因素

在当今时代，因为全球经济逐步步入一体化，经济运行方式、经济发展能力都会对语言的选择、使用以及未来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因此经济因素也许会超越其他因素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和制约语言使用、语言发展的因素。

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通常因为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语言选择权被大幅度削弱，考虑到要改善经济条件，许多人自主放弃本族群的语言，转为使用强势语言，以便获取更好的发展机遇，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例如，我们的调研地之一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铁厂乡新民寨村小组是普标人的聚居地，因为地处山区，比较穷困，普标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青少年初中毕业后大部分都出去打工，过春节才会回家。打工的地点大多在离家较远的昆明、四川等地。这些普标年轻人要在地生存和发展，汉语就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他们与汉族的同化不仅表现在语言上，现在他们的衣着、谈吐、生活方式、观念等已经被汉族同化。在其他几种语言的调研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村子里的青少年除了读书，一般都外出打工。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能够熟练运用汉语尤其是普通话，就能离开家乡，获取更多赚钱的机遇，从而改善自身的生活品质。在他们看来，使用何种语言与改善生活品质相比，后者更现实也更为重要。同时，由于急需改善经济状况，许多人是举家脱离了族群聚居地，这就使其后代失去了自然的本族语习得环境，进而失去选择语言的权利与条件，必然会成为汉语单语人。因为受到经济因素的驱使和制约，少数民族群体普遍认可并接受汉语，这必然会影响其选择并使用母语，也从客观上影响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和发展。

四、引起语言转用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

语言衰退或灭绝的另一影响因素是语言的转用，也就是语言族群中的部分甚至所有成员自主或非自主地转为使用另一种更便于开展交际活动的语言——一般是在使用人口、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上占优势地位的语言，逐渐乃至最终放弃自己的本族语。这一类型的语言衰退或灭绝并非由具体的物质因素造成，而是一种语言功能转换的文化趋同现象。

导致语言转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城镇化。一般情况下，一个族群越与世隔绝就越容易保持本族语言。这就难怪我们会发现本族语言保存得最好的是在乡村。城镇化却带来了相反的影响，它把来自各个区域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到同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地域来。为了相互之间能够交流，人们就得放弃自己本族语转而使用已经存在的共通语或交流域更广的语言。^{[9] (P214-217)} 例如，仙岛人原来居住在离村公所 12 公里，海拔 1400 多米的深山老林里。国家为了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在 1958 年、1995 年和 2009 年帮助他们进行了三次搬迁，分别落户于芒线村的勐俄寨和芒面村的仙岛寨。搬迁后的仙岛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电等各项设施齐备，交通也变得非常方便。当然，每一次搬迁都使他们离城市和城市生活更加接近，最后一次搬迁后，仙岛寨离公路的距离仅为 2 公里左右。由于经常和城镇居民接触，而在居住地又与更居主导地位的汉族或景颇族混居，为了交流的顺畅和便利，于是大部分仙岛人就不自觉地转用了汉语或景颇语。

第二，人口比重。在语言生态环境中一旦各语言族群人口比重出现变化，就会导致语言使用情况的转变。在特定区域中，各种语言通行与使用的程度通常与族群成员数目紧密相关，使用人数更多的族群语言通常使用功能也更强，使用人数较少的族群语言则使用功能也会受到限制。在云南怒江地区，因为傈僳族人数很多，在这儿居住的独龙族、怒族、景颇族与白族等，很多都开始转用傈僳语，傈僳语成了这一区域各个民族通用的一个交流工具。例如，在我们评估和调研阿依语时发现，调查对象中能够熟练地使用阿依语的比例为 37.9%，但是能够熟练地使用傈僳语的比例竟然高达 92.6%。即使是在木古甲村这样的阿依语核心地区，阿依人的第二语言的能力和水平已经明显超过母语。绝大多数的阿依人都会傈僳语，而且大部分阿依人的傈僳语讲得比母语好。

第三，现代媒体传播。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广播、电视等媒体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汉语正依靠现代技术和媒体的力量使其影响力更加广泛和深入。有些少数民族群体本来不太会汉语，但由于常常收听、收看汉语广播电视

节目，其汉语水平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有的少数民族儿童还没有走进校门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前就已经学会了汉语。这个时候，少数民族群体发现汉语这一国家通用语比本族语使用起来更便捷、交际范围更广阔。这样一来，相对弱勢的少数民族语言也许就会被抛弃，通信、科技在这样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明显的推动作用。

五、导致语言活力出现差异的跨境民族和跨境语言环境因素

在长期的民族发展进程中，因为战争、自然灾害、民族迁徙、国界划分的变动等原因使得同一民族分居于不同国家，通常是相邻国家的边境两侧，这种特殊的民族现象就称之为跨境民族。^{[10] (P154-157)} 由于以上原因使同一种语言跨越国界而分布在两个或多个接壤或邻近的国家，国界两侧或相邻国家的语言使用者彼此之间能进行基本的日常沟通，就形成了跨境语言现象。我国的跨境民族有 30 多个，跨境少数民族语言有 33 种。^{[11] (P12-17)} 云南是我国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跨境民族有 16 个。^{[12] (P9-20)}

在我们所调研的 7 种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中，属于跨境语言的就有 4 种，它们是：仂佬语、拉基语、普标语、阿依语。其中仂佬语、拉基语、普标语是跨越中国和越南边境的跨境语言，阿依语是跨越中国和缅甸边境的跨境语言。在中国云南境内使用这 4 种语言的少数民族群体中，仂佬族是被单独识别的民族，阿依人被归入怒族，普标人归入彝族，拉基人归入布依族。中国境内的阿依人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上帕镇、子里甲乡、鹿马登乡、利沙底乡，人口约 7000 人，缅甸境内的阿依人就是居住在缅甸北部克钦邦的日旺人，人口约 12 万，克钦邦的日旺人有自己的文字，是以马特旺方言为基础、用拉丁字母制作的。中国境内的普标人居住在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而在越南，普标人被划分成单独的民族，人口不详。中国境内的拉基人居住在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人口两千余人，在越南，拉基人被划分为单独的民族，称拉基族，人口将近 5800 人，主要分布在靠近中国边境的河江省和老街省。

根据黄行、许峰所做的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来看，跨境民族语言在语言身份、文字和书面语、语言使用功能等方面会出现一定的差异。具体来看有如下两点：首先，我国少数民族母语发生转用的情况通常比境外同一民族严重，例如普标语和拉基语在我国皆为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和几近消失的语言，但在越南，普标语仅属于受到威胁的语言，拉基语属于正在转用的语言。而仂佬语和阿依语则在境内外均为弱势少数民族语言。^{[13] (P9-17)} 就其原因来看，我国的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上长期受到汉语的影响，而境外的相同语言则受所在国家和地区通用语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汉语的影响更为强大，所以境内的跨境语言转用情况较境外更加严重。其次，跨境民族文字体系的境内外差异比较明显，例如我国境内的阿依语并无文字，但是在缅甸的阿依语却有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据考证为西方传教士在 19 世纪末所创制。虽然我国曾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过规模较大的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和改革文字的运动，但并未进行彻底，许多少数民族语言还未创制文字，已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得到预期的推行效果。因而，占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数的仍然是新创或未创文字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要获取和传播信息，必然就要使用汉语文或其他通用民族文字。因此，缺乏文字和书面语也是这些少数民族语言难以传承而走向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国周边国家的相同民族语言，多数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文字问题，因而在语言活力和影响力方面更具优势。

除此之外，还有导致语言代际传承中断的家庭环境因素（如混合家庭的出现）和推动汉语普及的教育环境因素等等。

结语

从上述分析能够得出结论，致使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功能退化的生态环境因素包含很多方面，也涵盖了多种层次。这些生态环境因素是互有联系、密切相关的。导致云南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濒临消亡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生态环境因素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根源上说，语言濒危甚至消亡是因为生态因素的影响，生态恶化导致其生存状态产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引发了语言使用功能的退化。上述探讨的是导致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普遍原因，但是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和各语言所处的不同的生态环境使得造成不同语言濒危的具体原因也会不尽相同。

【参考文献】

- [1]李怡. 关于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思考[A]. 母语的消失与存留-----第三届中国云南濒危语言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
- [2]王远新. 加强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调查及弱势和濒危语言的保护[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8 , (1) .
- [3]林建曾. 试论“改土归流”政策形成、推行的几个阶段[J]. 广西民族研究, 1988 , (2) .
- [4]赵旭峰.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 12 , (2) .
- [5]廖国强.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J]. 思想战线, 20 15 , (2) .
- [6]徐佳.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中国濒危语言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 1 0 .
- [7]寸红彬, 汪榕. 仙岛语-----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J]. 贵州民族研究, 20 14 , (6) .
- [8]李锦芳. 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
- [9]寸红彬, 王志君. 世界语言濒危总体概况及濒危语言评估方法[J]. 贵州民族研究, 20 13 , (3) .
- [10]何跃, 高虹. 论云南跨境教育和跨境民族教育[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 (2) .
- [11]周庆生. 中国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类型[J]. 文化学刊, 2014 , (3) .
- [12]方铁. 云南跨境民族的分布、来源及其特点[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 (5) .
- [13]黄行, 许峰. 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 14 , (2) .